

历史的孤独

姜长斌著



姜长斌 著

早期斯

年 1879—1924

中央党校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历史的孤独

——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年

姜长斌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京) 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年/姜长斌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0

ISBN 7-5035-1046-3

I . 历… II . 姜… III . 斯大林 - 人物研究 IV . A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3603号

历史的孤独

——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243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7.80元

(内部发行)

风光这边独好

(卷首语)

邢贲思

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就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①几年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里的社会主义严重受挫，而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却在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特别是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历史性任务之后所开创的崭新局面，使我们深深地感到，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具有很高的理论概括性，是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它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未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学地总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也为我们高瞻远瞩，增强对人类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所必需。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要的是，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②，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加符合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实际。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页。

邓小平同志前述论断的深一层含义在于，他指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的历史任务是截然不同的；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的任务集中在夺取革命胜利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上，而在夺取政权以后，则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保证，全力以赴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过去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和“消灭私有制”的任务，但却忽略了马恩在同一著作里提出的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一重要论断^①。《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止步于革命和专政，而是超越这一界限，较为具体地提出了建立专政以后的历史性任务。

人们过去对这一点缺少清醒认识的重要原因在哪里呢？我想，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在认识和总结马恩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时，长期地陷入了片面性。不错，马恩完成的主要工作是批判资本主义，发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尽管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他们对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在认识上有所变化，但是这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面。但是，从根本上说，这远远没有穷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科学内涵，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或者说，他们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理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探索具体实现途径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寓于它的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之中。

历史已经证明，教条主义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又会长期地被一种教条主义的片面性认识

^① 《共产党宣言》第35、38、4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所困扰，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还屡犯错误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斯大林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歪曲始终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列宁的学说所造成的。正是他把列宁主义变成了一种封闭的、僵化的、不可能再向前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我们知道，列宁是第一个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引入俄国的革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①

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是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就更是如此。列宁是在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既是俄国革命，又是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领导人，两大重任兼而有之。他毕生追求的，主要的、最终的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成为牵引人类进步的火车头。今天，对于我们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正是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及其实践。而被斯大林所埋没，所抛弃的恰恰是这一部分异常宝贵的财富。

十月革命后，即使是在国内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列宁始终没有忽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制订的新党纲根据列宁的建议，明确规定：“要以大力提高全国生产力作为决定苏维埃政权全部经济政策的主要点和基本点。”^② 1919年6月，列宁指出了发展苏俄生产力的根本标准是：“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③ 同年10月，列宁充满信心地说，一旦内战结束，苏俄“就将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④ 1920年12月，列宁清醒地指出：“我们现在落后于而且还将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如果我们不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4页。

③ 同上书，第37卷第18页。

④ 同上书，第39卷第407页。

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①正是在这种危急的历史背景下，1921年3月，在列宁的果断决策下，经过艰苦的斗争，苏俄的国内外政策才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在国内，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列宁力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格局，3月签订了苏俄—波兰里加条约，4月参加热那亚会谈并单独同德国签订拉帕洛条约，为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创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些重大的步骤，标志着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又完全正确地做出了一次巨大的飞跃。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并发展苏俄社会的综合生产力。此后，列宁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继续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到了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列宁就已经满怀信心地说，新经济政策是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和“唯一方法”^②。1923年1月，列宁更进一步地号召共产党人说：“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与学做“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列宁指出，经过“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之后，俄共“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③。这些论述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很接近了。

可惜的是，列宁过早的逝世，使得他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探索也随即中断了。斯大林虽不能说根本不注意经济建设，但在他当政的时期，俄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被无限地夸大，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被严重地歪曲，以致在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以后，反而把阶级斗争人为地推向一个极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斯大林以列宁主义的继承者自居，但是，正是他抽掉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把列宁主义概括为仅仅是关于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43卷第3页。

③ 同上书，第43卷第364、367页。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样一种片面化了的、被扭曲的对列宁主义的认识，曾经被第三国际和一些共产党奉为最高原则，给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害。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直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受斯大林错误路线的影响，相对说来是比较少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①但是，我们也切不可忽略，在对列宁主义的研究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清除某些片面的乃至错误的观点的有害影响，仍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无庸讳言，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和全部论述，至今仍对我们某些同志有较深的影响。

斯大林问题研究，是我们中央党校承担的国家“八五”重点课题之一。姜长斌同志是这项课题的主持人。

我很高兴看到这项研究正在顺利地起步。《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年》一书的内容，是我们过去知之较少的领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部书稿的另一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发掘、考证了大量的史实。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作指导，让史料来说话，——这是特别值得鼓励和提倡的科学态度。书稿作者的研究工作和写作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无疑，这对我们了解早年的斯大林很有帮助。书中把斯大林的民族问题理论及实践、《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等辟为专门章节进行讨论，对课题组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也会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姜长斌等同志的探索还仅仅是个开始。我认为，在斯大林问题研究方面还有很多重大课题有待深入探讨。例如，“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20年代联共（布）党内的大论战、“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及肃反扩大化、“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模式的历史地位、“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理论及实践问题，等等。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在斯大林问题研究上一定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要突破旧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决不能再因循守旧下去了；二是要切实防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持一概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总之，我们提倡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94年2月于中央党校

目 录

“不是多余的”前言	(1)
第一章 我们不得不从必要的“补充”开始	(4)
第一节 关于斯大林的家境与童年的补充	(4)
第二节 哥里教会小学	(7)
第三节 教会中学的反叛者	(10)
第二章 列宁学说的热心追随者(1899—1907年)	(22)
第一节 离开中学以后	(22)
第二节 政治立场和理论活动(1901—1907年)	(27)
第三节 早期斯大林的理论错误简述	(32)
第三章 从犹豫动摇到四年沉默	(40)
第一节 革命转入低潮以后的斯大林	(40)
第二节 反常的四年沉默	(52)
第三节 意外的自由和意外的“温和”	(56)
第四章 从独立倾向到同列宁发生正面冲突	(65)
第一节 关键时刻究竟站在谁的一边?	(65)
第二节 谁是列宁的得力助手?	(95)
第三节 内战时期的斯大林	(99)
第四节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	(122)
第五章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专家吗?	(125)
第一节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概念质疑	(125)
第二节 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之后	(144)
第三节 格鲁吉亚事件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147)
第四节 事件的白热化和成立苏联问题	(155)
第五节 同列宁最后的分歧与斗争	(166)

第六章	列宁主义定义之争和新理论权威的初步确立	(185)
第一节	论战的背景及概况	(185)
第二节	托洛茨基的发难	(193)
第三节	季诺维也夫的反击	(206)
第四节	理论家布哈林的贡献	(214)
第五节	谁将是胜利者?	(225)
第七章	斯大林的问鼎之作	
—	《论列宁主义基础》析要	(228)
第一节	理论“先声”及其独到之处	(228)
第二节	《论列宁主义基础》的问世	(232)
第三节	是列宁主义定义还是斯大林主义定义?	(234)
第四节	列宁主义的“根”在哪里?	(241)
第五节	暴力，能够概括列宁的革命方法论吗?	(244)
第六节	斯大林能够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吗?	(258)
第七节	低估农民问题是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之一	(263)
第八节	专政 + 暴力 = 一切?	(265)
第九节	党是“工具”? 或者民主集中制是 如何从视野里消失的	(279)
第八章	斯大林个人经历的三个问题	(287)
第一节	与孟什维主义政治上没有瓜葛，思想上有过相 通之处	(287)
第二节	一个讳莫如深的个人历史问题	(291)
第三节	斯大林不是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	(296)
第九章	如何评价早期斯大林的实践与理论?	(307)
第一节	革命家斯大林与革命家列宁有何不同?	(308)
第二节	斯大林的理论体系为什么能够迅速确立?	(319)
结束语		(329)
参考书目		(331)
早期斯大林年表 (1879—1924)		(335)

“不是多余的”前言

早在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前，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争论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进行的：一是在资产阶级知识界由于对不同时期苏联成就的不同评价而导致的对斯大林截然不同的看法；二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原第二国际，二战后的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二战后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之间由于社会主义理论分野而导致的对苏联领导人的截然不同的评论；三是二三十年代联共（布）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结果，使一些反对派人物流亡西方，如托洛茨基、拉斯科尔尼科夫等人在西方公开披露一些资料而引起的分歧。

应当说，上述每一个领域里的争论都是非常尖锐的。但是这些争论都局限在极其狭小的、特定的范围里，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以后，争论才正式展开并扩大到整个国际共运乃至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形成了高潮迭起、疑问日繁的历史公案大讨论场面。

在30多年的争论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三种趋势或三个极端。一种是把一切问题都归罪给斯大林个人（如，说他是阴谋家、暴君）；一种是把斯大林同列宁以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还有一种是就事论事，陷于自相矛盾的怪圈中。第一种趋势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符，它把斯大林现象的产生同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社会条件割裂开来，使我们无法理解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原则为什么会在苏联盛行长达近70年之久，并且其影响远远超出原苏联范围之外。第二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使人们

对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丧失信心，使原先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堕入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泥潭中。第三种趋势看起来似乎是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但是却在功与过之间建立不起理论的、逻辑的连贯性，使人如堕五里雾中。

我认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二种和第三种趋势或极端。第二种极端是导致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种趋势如果任其凝固化，极端化，将会在极大程度上限制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视野，极不利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必须看到，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造成我们长时期处于3个“停留”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斯大林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从来没有尝试从理论体系高度去分析、探讨斯大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体系的背谬实质。人们习惯的作法是，从具体的史实出发，如党内斗争，肃反扩大化、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党际关系、国家关系等“零碎”材料出发，对斯大林的不同侧面做出褒贬，至多上升到对他的个别理论观点进行简单的否定或肯定。

事实上，斯大林的全部实践都是在他的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他的每一项决策和活动都完全符合他的总体理论体系原则。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说他后来形成的理论体系不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内核，他没能真正地丰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相反，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变成了封闭的、僵化的教条主义体系。这不是斯大林一人之过，甚至也不单单是俄国落后的历史社会条件之过，这是人类社会主义处于幼稚时期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

我之所以敢于这样断言，不是因为我比其他理论家有什么高

明之处。有几个重要因素促使我多年来反复探索这一课题。一是对斯大林时期社会变化的不断深入认识；二是6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三是对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垮台深层原因的痛苦思考；四是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使我看到的希望；五是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完成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飞跃。这后一点对我下决心写这本书起了决定性的鼓舞作用。

当然，近年来披露的各种档案资料，对我进行理论思考，也是大有助益的。

我想，在这篇短短的前言里，似乎不必赘述用科学的态度搞清斯大林问题，对于我们摆脱陈腐观念的束缚，冲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窠臼”，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育与成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对于斯大林问题采取全盘否定，甚至否定他所经历的整整的一个时代的历史，显然是错误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其害无穷。但是，如果因为斯大林问题过分复杂而采取回避，不敢“触摸”的态度，同样也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斯大林留下的“遗产”仍会在我们的头脑里作祟，——这是客观事实。

为什么本书作者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早期斯大林的实践与理论上呢？因为，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太弱了，而不弄清斯大林的早期思想和活动，我们也无法说清楚他后来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

作者诚恳地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作者不敢奢望这里叙述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无懈可击的。

1993年5月于中央党校

第一章

我们不得不从必要的“补充”开始

如同任何革命理论家一样，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得以确立和发展，甚至被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法则。单就斯大林独特的理论体系来说，它经历了萌芽、完成、僵化三个阶段。确切些说，我们这里暂时只局限于研究它的萌芽阶段，即斯大林的早期阶段。

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完全不像国外许多评论家反复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智力水平低下的人，当然也不像托洛茨基断言的那样是一位“杰出的庸才”。正相反，斯大林从童年起就表现出是一个意志顽强、勤奋好学、智力超群而又极具独特个性的人。

第一节 关于斯大林的家境 与童年的补充

“斯大林（朱加什维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于1879年12月21日生于梯弗里斯省哥里市。他的父亲——维萨里昂·伊凡诺维奇是格鲁吉亚族人，出身于梯弗里斯省季季一利洛村农民之家，职业是鞋匠，后成为梯弗里斯市阿德尔汉诺夫制鞋厂工人。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出身于加姆巴烈乌里村农奴之家。”^①

^① 《斯大林传略》第5页，莫斯科，1950年俄文版。

关于斯大林的家境及其童年的生 活，“正史”均语焉不详。在由斯大林本人修改、审订的《斯大林传略》里，仅仅用了上述这一小段话就一笔带过了。

不知为什么，斯大林本人很不愿意回忆自己的童年。1931年12月，在他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长时间晤谈时，对方问斯大林：“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斯大林答：“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①（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很不坏”，仅此而已。

我在这一章里披露的史料，虽然鲜为人知，但较可靠，目的是为研究斯大林提供一些佐证。至于斯大林童年和20年代的经历，对他的个性及世界观的形成有何影响，这要留给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广大读者去判断，我个人很难说得具体、明确。

斯大林在20—30年代成名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专门讲述他的家世、童年和少年生活，其中妄加猜测之作并不罕见，讥讽、挖苦甚至臆造诬陷也屡见不鲜。

但也有一些著作中并不乏资料可信者。例如，斯大林的幼年和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挚友格鲁吉亚人伊烈马什维里（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并侨居国外）写的回忆录《斯大林和凄惨的格鲁吉亚人》^②就属此类。这本书提供的资料甚至早在1939年就被苏联作者正式引用过^③，这使我们能够窥见更多的具体情况。应当说，即使在政治立场反共的西方学者中也不乏态度认真、论据翔实的作品。

斯大林父母的祖先都是农奴，于1864年由沙皇废除农奴制后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0—101页。

② 柏林，1932年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使用的伊烈马什维里的回忆录，是从多种文字著述中转引的。

③ （苏）卡门斯基、维烈夏金：《领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载《青年近卫军》杂志，1939年第12期俄文版。

才获得迁居自由。格鲁吉亚农奴制的废止要比俄罗斯本土迟3年。斯大林的曾祖父曾在19世纪初参加反俄农民起义，后匿居梯弗里斯附近的季季一利洛村。到了斯大林父辈时，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进阿德尔汉诺夫皮鞋厂当学徒工，不久又回到哥里进一皮鞋作坊做工。在这里他结识了邻村的前农奴之女叶卡捷琳娜·格拉泽，并结为夫妻。当时叶卡捷琳娜年纪很轻，1879年生下约瑟夫时，她才20岁刚过，但已是第四胎也是最后一胎了。前三胎都不幸过早夭亡。约瑟夫是斯大林的名字，但幼年时都用小名索索称呼他。

朱加什维里一家租住一间小屋，陈设简陋，家境贫寒。父亲维萨里昂嗜酒如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每逢酒醉就会变得性情乖戾，蛮不讲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索索就成了被他痛殴的对象。他收入微薄，几乎全部用在“杯中物”上了。1885年索索5岁时，维萨里昂又回到了梯弗里斯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做工，虽同家庭未断联系，但经济上几乎对索索母子无所接济。叶卡捷琳娜只好到哥里市富人家里洗衣服，彻夜加工服装或作厨娘，勉强糊口度日。1890年索索11岁时，父亲因酒后与人殴斗，受刀伤致死。用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话说，索索父亲在世时，家里的情况是“在一个一家之主嗜酒成癖的、半文盲的贫穷家庭里，打架、相骂原本是常事，妈妈打儿子，丈夫又揍她。可是儿子爱娘，处处卫护她，有一天还将一把刀子朝老子扔了过去。老子于是大喊大叫去赶儿子，邻居把儿子藏了起来”。^①

家庭环境里这种暴力过度现象和行为，其实是俄国社会惯有的现象。后来，1915年，斯大林在致列宁的信中谈到党内“取消派”时竟说：“真见鬼，竟没人揍他们！难道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下去吗？！请让我们高兴一下吧，通知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成

^①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329页，北京，1980年版。